

王念劬：穿越火线为战友送热饭



个人简介：王念劬，1918年出生，1945年年初参加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日前，记者在市人民医院住院部见到了98岁的抗战老兵王念劬，年岁已高的他，虽然听力、记忆力下降，但精神抖擞，慢慢地向记者道出了他的参军经历。

王念劬还没出生时，父亲便因病去世。他出生不久，母亲因伤心过度，外加过度劳累也去世了，留下了他与年长4岁的哥哥相依为命。兄弟二人自幼靠别人救济生活，王念劬还在一座寺庙里生活了几年。1945年，看见有部队领导来招兵，王念劬便报名参军了。参军后没多久，王念劬随部队一直在三垛、甘垛、兴化一带活动，因为离日军宣布投降时间不远，部队也没有与敌人交战过几次，最大的一

次恶战当属兴化战役。由于刚刚参军，他没有机会上战场。“兴化战役是新四军对伪军的反攻作战，那时候，我是部队的炊事员，战斗打响后，我和其他炊事员一同挑着饭菜穿越火线，给战场上的士兵们送热饭、热菜。”王念劬说，记得那是8月下旬，我军先是攻城，肃清外围据点，没过两天，在晚上又发起了总攻，用山炮轰开城墙，很快攻进了城内，赢得了最终胜利。他虽然没有上战场参加战斗，但在后方听到好消息传来非常开心。

王念劬说，战争是很残酷的，牺牲也在所难免，将饭菜送到前线时，他们在战壕里都要猫着身子走，不能让头露出来，不然一不小心就会被对方的子弹射中。双方交战过程中，经常看见我军战士被敌人打中。尽管如此，我军战士们的表现都很英勇，一次攻打后，趁炮火停息，战士们才会轮流放下手中的枪，快速地吃饭，一有枪声、炮声响起，他们立即丢下饭碗，操起枪就打，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接着上，战士们没有一个人怕死，更没有逃跑、畏战的。

“为了让士兵们有力气打仗，部队领导都会尽力让士兵们吃饱、吃好。”王念劬说，那时候，部队的伙食比一般的老百姓家好许多，如果打仗胜利的话，还会拿缴获的一些好食物给战士们加餐。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念劬又随部队来到山东等地，参加了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中，我上过前线，也负过伤。”王念劬说，他随部队曾经历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也为孟良崮战役打过增援，在其中的一场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伤愈后没多久便转入地方参加工作。“中国能取得最终的胜利非常不容易，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永记于心。”王念劬说。

杨晓莉

徐晓明：打鬼子是最值得骄傲的事



个人简介：徐晓明，1922年出生，1941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地方游击队指导员。

在高邮如今健在的抗战老兵中，有一对夫妻——徐晓明和郑义珍。日前，记者在市中医医院病房内见到了这对曾一起走过那段峥嵘岁月的亲密战友，并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抗战经历。94岁高龄的徐晓明说，参军打鬼子是他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

徐晓明介绍说，他的老家在涟水，1941年年初，他刚结婚没多久，他表哥便来家中动

员他参军，在得到父母和爱人的支持后，他便随表哥到了部队。刚参加革命时，有点文化的徐晓明就担任了地方青救会（青年救国会）主任，主要是动员号召广大青年报名参军，每天和同志们一起书写、张贴宣传标语，还不时到老百姓家中动员青壮年参军，老百姓非常支持。

尽管没有在一线打仗，但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42年年初，参军仅1年时间，徐晓明便在表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徐晓明退出了后方的工作，加入了地方游击队担任指导员，开始战斗在一线。这时候，他有了参军后的第一把枪，是那种农村人用来打鸟的土铳。徐晓明说，为了打鬼子，部队士兵联合村民将村里的道路都挖成了交通沟，地下还挖了许多地道，在战斗中，我军战士进可攻，退可守。每次鬼子一进村，我军战士就躲在交通沟里跟鬼子们打游击战，敌人火力凶猛，我军招架不住时，就躲进地道里，常常搞得鬼子们晕头转向。鬼子们气得不止一次地前来想消灭游击队，但没有一次能如愿。“那时候几乎天天打仗，最多的一天打了四场。”徐晓明说。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晓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战争胜利后，徐晓明转业到扬州，后又到南京，最终在高邮落脚并定居。“我们全家人现在都生活在高邮，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徐晓明说。

杨晓莉

向抗战老兵致敬(八)

崔鸿喜：减轻战士伤痛是我的责任



个人简介：崔鸿喜，1930年出生，祖籍连云港灌南县，1942年参加革命，在部队里学医，是一名战地医生，1948年入党，1950年转业到扬州、高邮，一直从医，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今年86岁的抗战老兵崔鸿喜因患帕金森病一直住院接受治疗，虽手脚不停地颤抖，但当记者问起70年前的往事时，他仍记忆犹新，清楚地讲述了那段峥嵘岁月的点滴。

出生于连云港市灌南县农村的崔鸿喜，家中兄弟二人，他是老大，因为家境贫困，从小便在地主家放牛、做伙计。一天，地主家住进了几个八路军的便衣，他被地主安排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客人看他人虽小，做事却很机灵，都非常喜欢他，便问他：“我们是打鬼

子的部队，你想去打鬼子吗？”那年崔鸿喜才13岁，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没有任何犹豫就随他们一起进入了部队。

因为年龄小，崔鸿喜进入部队后，先是做勤务兵，照顾首长们的生活起居，后来又成为通讯兵，负责在灌南县周边来来回回送信。崔鸿喜说，当时部队经常与敌人打仗，一打仗难免有士兵牺牲、受伤，而部队后方医院的卫生员非常少，根本不能很好地照顾伤员，为此，领导便抽调了几名机灵的年轻战士当卫生员，他是其中之一。“我们在部队医院接受过正规的学习。”崔鸿喜说，成为卫生员后，大家一起被送至后方医院接受了半年多时间的学习，然后便正式上“战场”，一场战斗结束后，担架员一一将伤员抬到后方医院里，伤势重的就安排医生进行手术，伤势轻的，就由卫生员们负责包扎。那时候医疗条件非常简陋，药品也很缺乏，特别是麻药，一般只有接受手术的重伤员才能用上，而其他负伤的战士都很坚强，不轻易叫痛，有的战士痛得都咬破了嘴唇，也不会叫喊一声。

在参军的10多年里，崔鸿喜从负责包扎的卫生员成为能上手手术台做手术的医生，经他抢救康复的伤员不计其数。回想起当初的岁月，崔鸿喜说：“真的不容易。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什么苦没吃过、什么难没受过？那些在前线与敌人真刀真枪干的战士们都是英雄，为这些英雄服务，减轻他们的伤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崔鸿喜告诉记者，他参军没多久，弟弟也参加了军，后来在战场上牺牲了，这一直是他心中的痛。崔鸿喜说：“没想到当初的一别便是生离死别，战争太残酷了，多少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和平来之不易，现在的年轻人应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杨晓莉

郑义珍：与鬼子斗智斗勇逃过一劫



个人简介：郑义珍，1924年出生，1943年3月参军，同年在丈夫徐晓明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地方妇救会工作，专门负责带领全村妇女做军鞋、挖地道以及放哨、送情报等。

郑义珍与徐晓明同为涟水人，丈夫徐晓明参军后，时常不在家，她一人不仅要照看家里的田地、老人小孩，还要时时刻刻提防敌人的扫荡。郑义珍说，在一个寒冬的夜晚，她们刚吃完晚饭，敌人就进村扫荡。当时只有18岁的她带着年仅一岁的儿子往路边的草垛、坟堆里躲，她与儿子满头满脸都是霜雪，她将仅有的衣物包裹在儿子身上，但最终没有留住儿子幼小的生命。1943年3月，19岁的郑义珍在丈夫的介绍下，正式参加了军，并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村妇女救国会中的一员。

郑义珍告诉记者，一天深夜，一大帮鬼子和伪军敲开她的门，用枪指着她的脑袋让

她带路，送他们到鬼子的据点去。当时，鬼子的据点离她家有一里路的样子。为了想办法逃跑，她就带着他们走小路，因为小路附近有很多杂草树林，可以藏身。走到一片树林后，她谎称要小解，随后就找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鬼子吆喝着用手电筒照，还开了枪，几番寻找没有找到就走了。她躲在草丛里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回家。

郑义珍回忆说，那时候，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大都上了前线，妇女们除了放哨、做军鞋、送军粮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挖地道。当时，为了躲避鬼子的扫荡，在村与村之间挖了许多交通沟，鬼子来了，大伙就通过交通沟往其他村子跑。但是，这种交通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鬼子发现后，骑着马追，并用枪对着交通沟扫射，结果很多村民都被打死在交通沟里。后来大伙就开始利用夜间挖地道，刚开始时挖的地道有进口无出口，里面很闷，鬼子发现后就往里面灌水、放毒气，许多人被闷死和毒死在里面。最后，经过反复探索，才挖出了有多个进口和出口的地道。

郑义珍说，一般的地道，离地面有两三米深，进出口都很隐蔽，进口一般都用围墙、锅台等作掩护，出口在村外，也很隐蔽，一般情况下，鬼子很难发现。地道内四通八达，可容纳不少人。为防止鬼子灌水和放毒气，在地道的进出口都设置有挡板。最初，地道主要是群众用来躲避鬼子扫荡用的，后来逐渐成为民兵游击队打击敌人的有利屏障，凭借地道，游击队消灭了不少鬼子，跟电影《地道战》中讲述的抗日故事没什么区别。

战争胜利后，郑义珍随丈夫一同转业。回想起当年的那段岁月，郑义珍感慨地说：“现在的生活是当初想都不敢想的，只有中国强，百姓才会富，才能过上太平的日子。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再也不受外敌侵犯。”

责任编辑 张维峰